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陈子丹 著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陈子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陈子丹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1112-766-9

I. 民… II. 陈… III. 少数民族—档案资料—编辑学—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2840号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宋 武

装帧设计: 夏雪梅

封面题字: 魏惠仙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陈子丹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55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766-9

定 价: 45.00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电 话: (0871) 5031071



陈子丹，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11月生于昆明。史学博士，教授，档案学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现在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任教。

科研方面主要从事中外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学、档案信息编纂与开发利用等学科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涉及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贝叶档案、特色档案以及中外档案和档案工作等领域，尤其对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研究成绩显著。迄今已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75篇，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30篇，出版教材1部、专著1部、合著2部。参与完成国家级项目2项、主持完成省级项目3项、校级项目1项。教学和科研成果多次获省、校级奖励。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15)
第一节 史料与档案史料	(15)
一、史料	(15)
二、档案史料	(18)
三、史料与档案的关系	(24)
第二节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25)
一、少数民族口述档案	(27)
二、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档案	(31)
三、少数民族金石档案	(43)
四、少数民族贝叶档案	(53)
五、少数民族古文字档案	(55)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	(59)
一、白族古代档案	(59)
二、彝族档案文献	(61)
三、纳西族档案史料	(62)
四、傣族历史档案	(63)
五、藏族历史档案	(64)
六、傈僳族档案文献	(65)
七、回族档案史料	(66)

第二章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	(68)
第一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内容	(68)
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编辑工作	(68)
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工作	(70)
第二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类型	(72)
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参考资料	(72)
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专题汇编	(74)
第三节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编研的方法	(75)
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参考资料的编写方法	(75)
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专题汇编的编写方法	(76)
第三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历史与现状	(78)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	(78)
第二节 现代和当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	(87)
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88)
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89)
三、清史纂修工程	(89)
四、《格萨尔王传》	(90)
五、《中华大藏经》(藏文版)	(90)
六、编纂《全金文献》	(90)
七、编纂《中国藏西夏文献》	(91)
八、《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91)
九、《中国贝叶经全集》	(91)
十、《中国水书》	(92)
十一、档案资料编研成果	(92)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略	(94)
一、清代以前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活动	(94)
二、20 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的发展	(98)
第四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方法与技术	(104)
第一节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方法	(104)
一、选题	(104)
二、查找	(108)

三、选材	(110)
四、转录	(113)
五、点校	(115)
六、标题	(118)
七、编排	(120)
第二节 少数民族档案编研方法的探讨	(123)
一、少数民族档案编研现有方法介绍	(123)
二、少数民族档案编研方法实例解析	(124)
三、现有编研方法存在的问题	(125)
四、少数民族档案编研方法的拓展	(127)
第三节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数据库的建设	(128)
一、民族档案文献数据库的种类和内容	(128)
二、民族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131)
三、民族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136)
第五章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译注与出版	(140)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与出版的 内容、意义和方式	(140)
一、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与出版的内容	(140)
二、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与出版的意义	(141)
三、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与出版的方式	(142)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译注	(146)
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翻译工作刍议	(146)
二、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译注的方法论	(153)
第三节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出版	(165)
一、文献档案的出版	(165)
二、金石档案的出版	(167)
三、口述档案的出版	(167)
四、原始记事档案的出版	(168)
五、民族档案信息的网络出版	(168)
第六章 满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公布	(170)
第一节 明清两朝对满族档案史料的汇编和公布	(170)

第二节	民国时期满族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	(173)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176)
第七章	藏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185)
第一节	古代对藏族档案文献的编研	(185)
一、	古代藏族对藏文文献的编研	(185)
二、	古代汉族对藏文文献的编研	(186)
第二节	现当代对藏族档案文献的编研	(187)
一、	国外对藏文档案文献的编研	(187)
二、	国内对藏文档案文献的编研现状、近况及其成就	(188)
第三节	近年来出版的藏族重要档案文献汇编	(197)
第八章	彝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02)
第一节	西南彝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	(202)
一、	古代对彝文档案史料的翻译研究	(202)
二、	当代对彝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	(203)
第二节	西南汉文彝族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	(210)
一、	古代封建王朝对西南汉文彝族档案史料的编辑刊录	(211)
二、	目前对西南汉文彝族档案史料的编研利用	(215)
第九章	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23)
第一节	傣文档案史料的译注出版	(223)
一、	傣文古籍的译注出版	(224)
二、	贝叶经的整理出版	(226)
三、	傣文文书的译注出版	(228)
四、	傣文官印和金石铭文的译注公布	(229)
第二节	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公布	(230)
一、	历史文献对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公布	(230)
二、	新中国成立后对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公布	(239)
第十章	白族、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45)
第一节	白族档案文献编纂概况	(245)
一、	方块白文文献的整理研究	(245)

二、碑刻的编纂公布	(247)
三、民间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方面的成果	(250)
四、地方史志的编纂	(252)
五、白族档案文献开发利用的问题与对策	(253)
第二节 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	(254)
一、东巴经典大破译	(254)
二、丽江木氏土司史料文献的编纂	(259)
 第十一章 蒙古族、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出版	(263)
第一节 蒙古族档案文献的编纂	(263)
一、元明清和民国时期蒙古族档案文献的编纂	(263)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蒙古族档案文献的编纂出版	(267)
第二节 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利用	(271)
一、元明清时期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71)
二、20 世纪 80 年代后回族档案史料的整理、汇编	(272)
三、近三十年来云南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利用	(275)
四、回民起义史料的编纂	(279)
 第十二章 壮族、瑶族、羌族、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82)
第一节 壮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82)
第二节 瑶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85)
一、石刻档案的辑录	(285)
二、瑶书文献的汇编	(286)
第三节 羌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89)
第四节 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	(292)
 主要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298)

绪 论

在我国档案界,有人认为“‘编纂’、‘编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档案文献编纂是整个档案馆(室)编研工作的一部分”。^①但也有人认为,“编纂、编研在基本同义的理解上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斥或相互从属的关系。虽然,根据习惯叫法的不同,编纂、编研在档案界同时混用是无可非议的,但从术语规范上看,一般还是应以编纂作为规范的学术术语为宜。因为现在社会上大多承认编研中的‘编’即是‘编纂’,而且,在编纂、编辑、编写三者中,只有编纂一词能包括抄纂、编写两方面的内容,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与编辑相通”。^②本书对“编纂”、“编研”的理解基本倾向于后者。认为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亦可称之为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研,它既是档案部门或非档案部门(包括图书、文博、民族、科研、教育部门等)以馆(室)藏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为主要物质对象,以主动提供或报道少数民族档案信息内容为主要目的,在熟悉并深入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汇编和出版少数民族档案资料汇集、文集和编辑专题史料、编写各种参考资料和检索工具、参加民族研究和编史修志、利用少数民族档案撰写文章和著作等,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工作,又是围绕着一一定的题目范围,对收集挑选出来的少数民族档案文件进行考订、加工、编排和编辑出版,使原材料转化为不同形式的成品或半成品,以方便广大读者利用的工作。即编辑、加工、输出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主动、广泛、便捷地向社会各方面提供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服务的一项专门工作。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是以现有少数民族档案史料为物质对象,根据档

① 刘耿生. 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4.

② 韩宝华. 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0.

案的状况、客观需要以及编者的水平,选择一定时间内有较大查考利用价值的档案史料,采用不同方式,对档案史料的内容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的信息开发工作,形成受益面广、传递速度快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产品。

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工作是一种具有较高层次和较高效能的少数民族档案提供利用的方式,是保护少数民族档案原件和长久流传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有效措施,也是民族地区档案馆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的重要体现,是挖掘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加强编纂工作,提高编研水平,揭示和介绍馆藏内容,不仅是开发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方式,而且是衡量民族地区档案馆(室)工作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提高档案馆社会地位和增强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就是围绕“编”和“纂”的主要工作环节或工作过程。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①编纂选题;②查找与挑选;③考证、校勘和加工;④标题的修拟与编排;⑤辅文的撰写;⑥汇编的出版。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不断应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将发生许多全新的变化,电子出版物、光盘数据库、多媒体技术、数码影像技术、网上公布等,对传统的档案史料编纂方式方法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也促使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学必须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为它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是各民族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少数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宗教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知识信息资源,是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和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的重要条件之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是少数民族档案整理的高级阶段,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今后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克服少数民族档案在提供利用方面诸多不便因素的有效措施,尤其是使少数民族档案开发利用工作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相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研,不仅有助于挖掘地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反映出民族特色,弘扬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涉及的地域很广,历史上消失的少数民族

也很多。但是,很多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也很丰富。中国多民族的包容性与地域辽阔,便于迂回的优势,使大量古籍和档案文献得以保留,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历经战乱、天灾与动乱而幸存的古籍和档案文献,却因日益恶劣的环境与维护不力而被严重毁坏,或成砖成渣,或脆化虫蛀,或霉变退色,亟须抢救。抢救整理民族古籍和档案文献,就是要从文献史料中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编辑出版民族档案史料是关系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事。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批准人民政府进行少数民族大调查,还拍了纪录片。从1950至1970年,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先后完成了16个少数民族的21部电影作品,片长达123本,时长约1230分钟。现在,片中记录的许多历史镜头已经不存在了。国务院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以后,在古籍档案保护和抢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少数民族古籍档案保护工作走上了正轨。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8条规定,要“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国家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编纂公布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档案史料,既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内容之一,更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它可以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广泛的信息来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编研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编研和开发利用又可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加快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速度、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伐、提高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既是繁荣少数民族科学文化事业,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档案法》赋予档案部门的一项光荣使命,尽

快开发可以利用的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促进民族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挖掘整理好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好少数民族档案方面的书刊,能让少数民族档案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几代档案工作者的心愿,也是一件修存史、嘉惠学人、永泽后世的伟业。

二

满族十分重视本民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早在皇太极时期就编纂了《满洲实录》、《太祖实录》。满族入关前还编纂了《满文老档》和《国史院档》。《满文老档》不仅是满文创制以来的第一部满文文献,也是满族最早的一部档案文献。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组织编纂了大量起居注、实录、圣训、谕旨、奏议、会典、方略等书,在档案文件的汇编方面成绩显著。从20世纪30年代起,罗振玉、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等个人和单位先后编印了一批清代满族历史档案,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贡献较大,连续编纂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文献专刊》、《文献论丛》等专题汇编,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出版各种汇编成果50余种,370多册。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编印了《明清史料》,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了多种档案资料汇编。此外还有《清史稿》的著成和《清实录》的刊行。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满族历史档案最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1925年至2003年累计公布档案达64万件。2003年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后,对清代满文档案和汉文文献以及国外有关清史的外文文献和档案进行空前规模的编译、公布和出版,估计字数将在几亿到几十亿之间,将会出版上千种不同的书籍。

藏族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研由来已久。古代藏族和汉族都对藏汉文文献的编纂作出了贡献。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学者编译的《新疆的藏文史料》、《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纂公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为传统藏学研究提供了大批丰富、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西藏与祖国关系史料汇编》、《藏文史料译文集》、《铁虎清册》、《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图说百年西藏》的编辑出版格外引人注目。一大批藏学家和史学家利用藏汉文历史档案撰写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参加编史修志,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和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彝族档案文献的编译研究应始于西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收录了东汉时川西南部落首领白狼王创作的《白狼王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也引用了彝文文献。元明清时期，“四夷馆”和彝族上层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彝文文献的编译。1936年出版的《彝文丛刊》（丁文江与罗文笔合译）意义重大。近年来，云贵川三省对收集到的彝文档案史料进行了大量的译注出版工作，贵州毕节地区行署成立了彝文编译组，编译了《西南彝志》、《物始纪略》、《水西全传》等彝文文献，四川省编译了《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尔比尔吉》（凉山彝文资料选译），云南编辑了《彝文文献译注》、《彝文石刻译选》、《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以及享誉中外的彝族著名叙事长诗《阿诗玛》和“阿诗玛文化研究丛书”等。对西南汉文彝族档案文献的编研利用也做了大量工作，为研究西南民族史、彝族史和编纂《彝族通史》、《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出版物。

蒙古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始于《蒙古秘史》的编纂，明朝利用元朝档案撰修了《元史》，清朝官修的史书中收录了许多有关卫拉特的历史文献，民国时又编纂了《新元史》。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档案文献编纂一手抓汉文档案编研，一手抓蒙文档案编研，先后出版了《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资料选编》等编研成果。1999年还出版了120万字的《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资料汇编》，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在内蒙古档案史上尚属首例，此书的问世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工作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此外，在八思巴文文献、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托忒蒙古文文献的编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近年来编纂的“成吉思汗八白室系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部门首次公开出版的大型蒙古文历史档案文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回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见于元代《秘书监志》中收录的“回回书目”，明清时期，正史及实录、起居注、方略中均有关于回民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后，白寿彝先生整理出版了《咸同滇变见闻录》、《回民起义》等史料。近年来，在回族书籍类、铭刻类、文书档案类、口碑类古籍文献的编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出版了《南方回族古籍丛书》、《回回古代全书》、《中国回族金石录》、《清代穆斯林档案》、《云南回民起义史料》、《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诗》（大型画册）等一批重要成果。

白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最早始于宋元时期用“白文”编纂的史志文献,如《白古通记》虽是一部南诏、大理国史,但由于它记载了历代统治家族世系名号、年代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因而又是一种大事记性质的档案文献,后来成为明代《滇载记》、清代《夔古通纪浅述》等书编纂的蓝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理地区十分重视白族文献的编纂公布,在方块白文文献、碑刻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等方面的汇编成果十分丰富,先后完成了白族民间文艺集成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的浩大工程。特别是《大理丛书·金石篇》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白族的“永乐大典”。

纳西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可追溯到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编纂的一些史料文献,如《木氏宦谱》、《木氏六公传》、《皇明恩伦录》等。1981年东巴文化研究室成立后,坚持对东巴经进行长期不懈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完成了数千种东巴经的记音记义和对译意译工作,刊印出版了多种东巴经译注本,摄制了东巴教仪式录像带,录制了东巴祭司诵经录音带,完成了东巴教仪式规程文字资料的记写、翻译和整理。经过老东巴和研究人员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于2001年出版了千册百卷本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是我国跨世纪的一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和出版工程,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堪称东巴文化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在新中国成立前成果很少,只在史志文献中全文或部分刊录了一些汉文傣族史料。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傣文史料翻译组,先后译出了20万字的史料。80年代后,在傣文古籍、文书、官印、金石铭文的译注出版以及汉文傣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公布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和丰硕成果,出版了《德宏史志资料》、《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中国傣族史料辑要》、《中国云南德宏、耿马傣文古籍编目》等一批文献材料,2002年又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将陆续出版多达百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

壮族档案史料的编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经过广大编辑出版人员20多年的精心编纂和出版,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先后完成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壮族历代史料荟萃》、《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等一批汇编成果。200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了《壮学丛书》的编纂计划,成立了编纂机构。该丛书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壮族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学术丛书,由研究资料和研究专著两大部分组成。研究资料部分主要搜集整理壮族主要的典籍、资料、人物著作及民歌古籍,编纂辞

书,保存壮族文化遗产,供人们阅读和研究之用。首批研究成果《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已问世。

撒拉族档案史料的编纂早在明代就开始见诸于汉文官方文献中,现在保存的有关撒拉族的明朝、清朝、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汇编较为丰富。从20世纪60年代起,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先后编纂出版或内部铅印了《明实录、清实录撒拉族史料摘抄》、《撒拉族档案史料》、《撒拉族史料辑录》等成果。由撒拉族专家学者承担的项目《撒拉族史料集》、《撒拉族文献编译》,将对历史上形成的撒拉族史料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

畲族档案史料的编纂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编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后来少数民族故事、民歌、谚语等集成系列丛书的出版,抢救了一大批民族文化,保存了不少畲族史料。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或地域等原因,畲族档案史料的收集和开发利用还显得较为滞后。近年来,随着畲族地区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一批新的成果相继面世,如《畲族祖图族谱》、《畲族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广东畲族古籍资料汇编》、《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畲民家族文化》等,这批书籍的出版对研究畲族的历史和现状、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以及抢救少数民族古籍、弘扬畲族优秀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水族档案史料的编纂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重视。除汇编了汉文史料《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外,已对分布在贵州三都、荔波等地的水书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救和整理,计划出版《中国水书》100册(现已出版了前3卷)。此外,荔波县还聘请了专门的翻译人员,对进馆水书进行翻译和研究,已有10册原件译成汉文,约120万字。其中已注译国际音标的有4册;约42万字。目前正在编纂《荔波县馆藏水书总目提要》、《水书营造安葬选译汇编》、《水书字典》等工具书,《陆道根源》、《甲子卷》等也在翻译中。

其他一些民族的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民族的汇编成果主要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锡伯族的《锡伯族档案史料》、《辽宁锡伯族史话》;维吾尔族的《维吾尔史料简编》;苗族的《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936—1950》、《融水苗族埋岩古规》;瑶族的《瑶族石刻录》、《广西瑶族历史资料》、《瑶族〈过山榜〉选编》、《瑶族过山牒文汇编》、《评皇券牒集编》;羌族的《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辑》;布依族的《黔西南布依族乡规民约碑》;哈尼族的《红河哈尼族谱牒》;独龙族的《云南省独龙族历

史资料汇编》；土家族的《土家族土司史录》；黎族的《黎族古代历史资料》等。

三

少数民族档案是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些民族地区档案馆在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资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相对于各民族丰富多彩、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源来说，这种开发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不能满足社会利用特别是民族研究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当前，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成为一大薄弱环节。如发表介绍性、宣传性、报道性、总结性的文章和编制各种指南、索引、汇编、选编、参考资料较多，而发表有创见的探索性文章和出版有理论深度的高质量著作则相对较少，从而形成编研内容层次低浅化的现象。

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边疆民族地区档案馆的编研工作还是一个弱项。主要表现在：一是档案馆基础设施差，功能不齐全，观念还停留在馆库修建、接待日常查借阅工作上，对编研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当做重点来抓；二是档案部门的档案编研人员素质普遍偏低，工作任务重，缺少专职编研人员；三是编研内容针对性不强，编研成果价值不高，不能满足系统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信息的需要；四是编研成果少，而且缺乏深度和连续性，其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五是编研成果政策效用偏高，文化功能偏低。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档案管理方面一些政策性措施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虽然在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工作进度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差距很大。以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为例，仅靠为数不多的几个档案编研人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满文档案史料既有重要价值，而当前通晓满文、能直接利用满文史料者却寥寥无几。据了解，目前我国数百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者不过几百个人，懂得文字的就更少。这就形成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学术界和史志工作者鉴于清代前期和边疆地区汉文史料的缺乏，迫切要求尽快翻译出版满文档案史料；另一方面，当前满文档案专业翻译人员仅20余名，远